论近代资产阶级的“以商立国”思想

张守军

在以自给自足的封建农业为基础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思想史上,农为国本,以农立国的思想 2000 年间一直处于统治地位。但是,大约 100 多年前,即在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却猛然涌起了一股“商为国本”、“以商立国”的思潮。它发展迅猛,很快成为 19 世纪后半期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主流。它彻底冲垮了中国传统的以农立国的思想,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面貌。这股思潮的鼓吹者是中国近代第一批资产阶级思想家,深入研究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的这股资产阶级的“以商立国”思潮,今天对我们尤其具有启发意义。

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早在明朝中期既已产生,但由于封建制度的阻碍,发展极为缓慢。1840 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大门被西方侵略者以武力打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19 世纪 60 年代,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起家的洋务派官僚为了对付人民革命,加强自己的军阀派系力量,在外国侵略者的帮助下,建立起一些新式军事工业。70 年代初,他们又采取“官办”或“官督商办”的形式,创办了一些新式民用企业。这些洋务派官僚和主持这些企业的大买办,即是中国大资产阶级的前身。19 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商人,地主或中小官僚也开始投资创办新式工业,到 80 年代,这种民族资本经营的企业已经有四五十个,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了。

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产生的同时,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资产阶级思想家。这些人绝大多数是站在新生产资产阶级立场上的知识分子。他们有的是由封建知识分子转化

而来的,如王韬;有的是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的,如马建忠、薛福成;也有新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陈炽。除知识分子出身者外,也有从事工商业活动的资本家,如郑观应。早期资产阶级思想家都有较好的西学基础,几乎都到过西方。他们是一批当时最了解西方情况的人物。他们强烈要求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把中国变成一个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著书立说,奔走呼号,为发展中国资本主义大造舆论。“以商立国”、“振兴商务”,就是他们提出的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纲领性口号。

资产阶级的“以商立国”思想,是作为地主阶级“以农立国”的封建传统思想的根本对立物出现的。它是对统治中国 2000 年之久的封建传统经济思想第一次全面而彻底的否定。

中国封建传统思想把商列在士、农、工、商四民之末,资产阶级的“以商立国”思想则认为商是四民之纲,地位最重要。薛福成说:“有商则士可行其所学而学益精,农可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可售其所作而作益勤,是握四民之纲者,商也。”^①

郑观应也指出:“商以贸迁有无,平物价,济急需,有益于民,有利于国,与士、农、工互相表里。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是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也。商之义大矣哉!”^②就是说,商是士、农、工三者发展的推动者和带动者,它能够带动和促进科技教育和农业、工业的发展。因此,它不是四民之末,而应为四民之首。

① 《庸庵海外文编·英吉利商务辟荒地说》

② 《盛世危言·商务二》

中国封建传统思想认为农为富国富民的本业或基础,资产阶级的“以商立国”思想则认为商是富国富民之本。郑观应指出:“稽古之世,民以农为本,越今之时,国以商为本。”^①薛福成说:“生财之大端在振兴商务。”^②王韬认为:“商富即国富”^③,商务发达,可以塞漏卮,开利源,夺利权。所以,他们认为,富国富民,必须振兴商务。如不注重商务,就会“四海困穷,民贫财尽”。^④

中国封建传统思想认为征服天下要靠农战,资产阶级的“以商立国”思想则认为中国要抵制列强侵略,与西方资本主义争强,则必须靠商战。薛福成说:“昔商君之论富强也,以耕战为务,而西人之谋富强也,以工商为先。”^⑤王韬认为,西方国家都是“以商力裕其兵力,兵力佐其商力。”^⑥中国要不被西方列强灭亡,“必如西国兵力商力二者并用,则方无意外之虞。”^⑦郑观应则明确提出了抵制西方列强侵略的“商战”思想。他认为西方列强“不独以兵为战,且以商为战。”^⑧商战比兵战更危险,“习兵战不如习商战。”^⑨要抵制资本主义的侵略,不仅要进行兵战,而且要进行商战,只有“决胜于商战”^⑩,才能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使中国立于世界强国之林。所以,“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⑪。

既然商是四民之纲,立国之本,所以封建传统的抑商政策和措施必须彻底抛弃。资产阶级思想家愤怒谴责封建统治阶级“但有困商之虐政,并无护商之良法;”^⑫“袒媚洋商而摧折华商”^⑬的倒行逆施做法。指出中国“好持崇本抑末之说”^⑭,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是中国商务衰落的根本原因。为了振兴商务,他们要求抛弃封建抑商政策,向西方国家学习,保护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郑观应指出:“西人以商为战,士、农、工为商助也,公使为商遣也,领事为商立也,兵船为商置也,国家不惜巨资,备加保护商务者,非但有益民生,且能为国拓土开疆也。”^⑮从这种必须保护商护商的观点出发,他们要求废除各项困商弊政。如坚决裁撤厘金,就是他们在这方面的一项重要主张。陈炽还主张制定商律,体恤商情,以保护和促进中国商务的发展。他认为采取这些惠商之政,中国商务就可以振兴。

他们还主张抛弃歧视商人的封建贱商思想。郑观应认为:“苟能一变隆古之习,视商如

士,……礼以待之,信以任之,……商籍准就近应试,殷商准接见官长。商品既重,商人自多。商户既多,商力愈盛。商力盛则气势转,气势转则商务旺。”^⑯他主张国家对振兴商务卓有成就的商人即资本家要重予褒奖:“宜令民间纠合公司,大兴商务。如利藪可兴,亦有成效者,国家给以称颂功牌。”^⑰不仅在名誉上给商人以表彰,而且在政治上也要提高商人的地位。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商人政治地位极其低下,商贾不得仕宦为吏,几乎是封建社会一条不成文的法律。郑观应认为,在政治上给商人以平等的地位,是振兴商务的重要条件。他说:“使为贾者不得为官,则人或以商务为浊流,而鄙夷不屑。乃为官者正不嫌其为贾,则人将以商务为正路,而黽勉以图。”^⑱郑观应主张在朝廷设商部,在各省设商务总局,总局以下设分局,由“老成练达,有声望之殷商”^⑲担任总办之职。商人要为官参政,是“以商立国”思想在政治上的客观要求。总之,以商立国,不仅要求确立商业在经济上的首要地位,而且要求提高商人在社会上的政治地位。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还是在社会道德舆论上,都要真正把商摆在立国之本的重要地位。

二

近代资产阶级的“以商立国”思想,是主张大力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思想。

近代资产阶级主张“以商立国”,实质上是主张以商为中心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经济。

- ① 《盛世危言·商战上附录》
- ② 《庸庵海外文编·强邻环伺述陈愚计疏》
- ③ 《园文录外编·代上广州府冯太守书》
- ④ 《盛世危言·商务三》。
- ⑤ 《筹洋各议·商政》
- ⑥ 《园文录外编·星绍指掌序》
- ⑦ 《园文录外编·英重通商》
- ⑧ 《盛世危言·商战下》
- ⑨ ⑩ 《盛世危言·商战上》
- ⑪ 《盛世危言·商务三》
- ⑫ 《盛世危言·商务二》
- ⑬ ⑭ 《续富国策·创立商部说》
- ⑮ 《盛世危言·商战下》
- ⑯ 《盛世危言·商战下附录》
- ⑰ ⑱ 《盛世危言·捐纳》
- ⑲ 《盛世危言·商务一》

他们所说的商,不只是指商业,凡是和商业、外贸有关的各个行业、各项事务,实际上都包括在他们所说的“商务”范畴之内。比如,陈炽认为:“商之本在农,农事兴,则百物蕃而利源可浚也;商之源在矿,矿务开,则五金旺,而财用可丰也;商之体用在工,工艺盛,则万货殷阗,而转运流通可以周行四海也。”^①郑观应也指出:“商出于士、农、工三者之力。”^②振兴商务必须使农、工、商各业都得到发展。从这种认识出发,他们的“以商立国”、“振兴商务”主张,不只是要求发展商业一个部门,而是要求以商为中心发展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如王韬主张的兴利,不仅要兴出洋贸易之利,而且要兴开矿之利,织经之利,造轮船之利,兴造铁车铁路之利。薛福成提出的商务之要,也不仅有贩运,还有艺植与制造,即发展现代农业生产与机器制造业。郑观应在《商战》中列举的十大商务纲目更为全面,几乎包括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的各个行业:1. 振兴丝茶二业;2. 广购新机,自织各色布匹;3. 购机器织绒毡、呢纱、羽毛、洋衫裤、洋袜、洋伞等物,炼湖沙造玻璃器皿,炼精铜仿制钟表;4. 造纸、卷烟、酿酒制糖;5. 制丝茧,纺棉纱,制造香水洋胰;6. 遍开五金、煤矿;7. 广制煤油,自造火柴;8. 整顿磁器厂务;9. 以杭宁之机法,仿织外国绉绸;10. 各关鼓铸金银钱。总之,中国商务振兴之日,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各行各业在中国全面发展之时。

当时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个是大型机器生产力,一个是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和剥削关系,这二者,资产阶级思想家都极力称颂并主张从西方照搬。

他们非常强调中国采用资本主义大型机器生产,认为这是振兴商务的重要条件。郑观应指出:“商务之原,以制造为急;而制造之法,以机器为先。”^③把采用机器生产看成是振兴商务的先急之务。薛福成论述了使用机器之所以能使商务振兴的原因,他说:“有机器,则人力不能造者,机器能造之;十人百人之力所能造者,一人之力能造之。夫以一人兼百人之工,则所成之物必多矣。然以一人所为百人之工,减作十人之工之价,则四方必争购之矣。再减作二三人之工之价,则四方尤争购之矣。然则论所成之物,一人可兼十百;论所获之价,一人可兼二、三,加以四方之争购其物,视

如减十减百之便利,而谓商务有不殷盛,民生有不富厚,国势有不勃兴哉!”^④薛福成在这里指出,用机器生产可以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商品成本,提高商品竞争能力,从而促进商务发展。

他们不仅主张在各部门采用现代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而且主张采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他们反对洋务派创办新式工业所采取的封建官商政策,认为新式工业必须由私商即私人资本家自由经营。马建忠指出,他提出的讲求土货,仿造洋货及开采宝藏等项振兴商务的措施,“其办理之法,总以商人纠股设立公司为根本。”^⑤郑观应也认为:“凡通商口岸,内省腹地,其应兴铁路、轮船、开矿、种植、纺织、制造之处,一体准民间开设,无所禁止,或集股,或自办,悉听其便,全以商贾之道行之,绝不拘以官场体统。”^⑥他们极力赞赏这种中国过去所没有的新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认为它不仅是唯一能够促进中国商务振兴的经营方式,而且是对中国资本家和无产者都有利的经济制度。薛福成说:“余观西洋用机器之各厂,皆能养贫民数千人或数万人。盖用机器以造物,则利归富商;不用机器以造物,则利归西人。利归富商,则利犹在中国,尚可分其余润以养我贫民。”^⑦陈炽甚至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工人最有利:“富人出资立厂,而贫民之工作者辄数千人,富民之获利一二分而止,而贫民之工资增至倍蓰什伯而未已焉。故机器之兴,专以为贫民计也。”^⑧

近代资产阶级的“以商立国”、“振兴商务”主张,实质上是在中国发展现代资本主义大型机器生产,建立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主张。

近代资产阶级“以商立国”的思想,也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进步思想家关于对外开放,学习西方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鸦片战争以后,林则徐、魏源等进步思想家曾对封建的闭关锁国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们主张学

① 《续富国策·创立商部说》

② 《盛世危言·商战下》

③ 《盛世危言·商务五》

④ ⑦《庸庵海外文编·用机器殖财养民说》

⑤ 《透可斋记言·富民说》

⑥ 《盛世危言·商务二》

⑧ 《庸书·养民》

习西方的先进军事技术,以战胜西方侵略者。太平天国革命时期,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官僚,出于镇压农民起义和维护清朝统治的需要,也主张学习西方现代军事技术,制炮造船。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的“以商立国”思想认为,西方国家的富强主要不在于他们船坚炮利的军事技术,而在于他们“以商立国”的经济制度。马建忠以自己在西方的亲身体会直接批判了李鸿章的洋务派观点。他说:“欧洲各国‘讲富者以护商会为本,求强者以得民心为要。……其制造、军旅、水师诸大端,皆其末焉者也。’”^①郑观应也批判洋务派的自强之术是“只知形战不知心战”,是“舍其本而图其末,遗其精意而袭其皮毛。”认为:“我国欲安内而攘外,亟宜练兵将,制船炮,备有形之战以治其标;讲求泰西士农工商之学,裕无形之战以固其本。”^②他明确指出:“中国以农立国,外洋以商立国”^③,这是中国与西方制度的根本区别,中国要赶上西方,战胜西方,必须向西方学习,振兴商务,此外别无出路。“以商立国”、“振兴商务”,是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的学习西方,对外开放的经济纲领。

从以商立国的观点出发,他们更深入地批判了封建的闭关锁国思想。他们指出,如果说古代可以闭关锁国而治,那么,处于万国通商的资本主义的时代,一个国家要独立于世界市场之外,根本不可能。不振本国商务,只能在国际通商中处于不利地位,致使国家日益贫弱。薛福成说:“盖在太古,民物未繁,原可闭关独治,老死不相往来。若居今日万国相通之世,虽圣人复生,必不置商务为缓图。”^④马建忠也指出:“夫处今之世,轮舟铁道校织囊中,而欲自固于一隅,禁绝外人之往来,势必不能,不若因其形而利之,以广我之利源,推行尽善,国富民殷。”^⑤认为中国必须根据国际贸易的需要,一方面要“精求中国固有之货”^⑥,即发展中国出口商品的生产;另一方面则要“仿造外洋之货”^⑦,以减少外国商品的输入,争取使出口货多,进口货少,以获取更多的外汇收入,用现代技术改造中国经济,系统地提出了一套以对外贸易为导向,在中国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主张。

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虽然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但封建主义仍然处于统治地位。在世界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的时代里,一个

面临着被资本主义列强灭亡危险的落后的封建主义国家,它的唯一出路,就是学习、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走资本主义道路,把自己变成一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近代资产阶级的“以商立国”思想,要求中国向西方学习,采用西法,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这一思想,符合19世纪后半期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顺应了资本主义必然取代封建主义的社会发展总趋势,因此在历史上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

三

“以商立国”思想尽管在历史上的作用应予肯定,但它毕竟是中国最初产生的资产阶级思想,因此它在理论上还很不成熟,有许多缺陷,它的作用因而受到了局限。

封建生产方式是以自给自足的农业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由于生产力水平低,分工不发达,农民既生产自己所需要的农产品,也生产自己所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地主剥削农民的地租,也主要用于自己消费,而不用于交换。因此,在以农业为主的封建社会里,商品货币经济极不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则不同,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社会分工极为发达,社会生产分化为无数个不同的部门和行业,各部门、各行业又拥有无数个私人资本主义企业。这些部门、行业、企业既互相独立,又互相依赖,他们通过商品交换而紧密联结为一个整体。各部门、各行业、各企业的生产实际都是商品生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几乎一切产品都要经过流通过程。不仅劳动产品,而且连人的劳动力也变成商品,也加入交换。封建经济是落后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则是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产生这种区别的原因,是由于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是两个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上的社会。“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⑧生

① 《适可斋记言·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

② 《盛世危言·商战下》

③ 《盛世危言·商务三》

④ 《庸庵海外文编·英吉利利用商务辟荒地议》

⑤ 《适可斋记言·巴黎复友人书》

⑥ ⑦ 《适可斋记言·富民说》

⑧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

产力发展水平不同是资本主义社会优于封建社会的基本标志,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对立不过是手工磨和蒸汽磨的对立在流通领域里的表现而已。资本主义国家比封建国家富强不是由于它实行了商品经济,而是由于它高度发达的大机器生产力和较封建制度更能促进生产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主义财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流通过程并不生产财富。以现代大机器生产力为手段,在生产过程中榨取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这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富强之本。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是“以商立国”的观点,显然没有揭示出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

把封建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对立归结为“以农立国”和“以商立国”的对立,显然是一种停留在封建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表面现象上的极为肤浅的认识。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思想家所以会把商看成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有其客观的和历史的原因。第一,是由于他们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缺乏深入的了解。中国资本主义很不发达,基本上是一个以封建农业为主的国家,早期资产阶级思想家很难从中国的实践中认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各个环节之间的内在联系。他们来到西方,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为中国这个封建古国所没有的繁荣的商品货币经济,这种明鲜而强烈的对照,很容易使他们把商看成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第二,西方资本主义当时对中国经济侵略的形式,也加强了他们这种认识。19世纪中后期,正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鼎盛时期。“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①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正是在西方资产阶级向中国推销商品,远来中国经商时认识西方资本主义的。而落后的中国正是由于在中西贸易中不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对手,才遭受重大的经济损失,而积贫积弱的。这种情况也使近代资产阶级把“以商立国”看成西方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把振兴商务看成中国走向富强的根本出路。第三,在生产与流通的关系上,虽然生产决定流通,但流通又会反过来给生产以极大的推动力。资产阶级财富是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但离开流

通,没有流通过程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就无法进行,资产阶级的财富就不能增殖。中国资产阶级要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但在封建抑商政策的摧残下,中国市场萧条,交通落后,封建关卡林立,资产阶级的买卖活动到处受阻,不扫除流通过程中的封建障碍,不振兴商务,没有流通的强大推动力,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活动就难于蓬勃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迫切需要从振兴商务中获得发展的强大推动力。这也是早期资产阶级把“以商立国”、“振兴商务”作为其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纲领口号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正确的理论纲领的作用不可能持久。到19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进步,“以商立国”思想便逐渐被人们摒弃,失去了它在经济思想舆论界的领导地位。首先,七八十年代鼓吹“以商立国”的一些思想家,到90年代,开始自我否定了。曾经提出商握四民之纲的薛福成,于1893年提出了“工实尚居商之先”的观点:“泰西风俗,以工商立国,大较恃工为体,恃商为用,则工实尚居商之先。”^②郑观应也在1900年提出“西人之富在工不在商。盖商者运已成之货,工者造未成之货,粗者使精,贱者使贵,朽废者使有用。有工艺然后有货物,有货物然后有商贾耳。”^③他们实际上否定了商为资本主义经济中心的“以商立国”思想。

1895年,资产阶级思想家张謇对早期资产阶级思想家鼓噪一时的“以商立国”思想进行了直接的批判。他说:“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讲格致,通化学,用机器,精制造,化粗为精,化少为多,化贱为贵,而后商贾有懋迁之资,有倍蓰之利。”^④他尖锐地指出,认为资本主义是“以商立国”,那是停留在表面现象上的“皮毛之论”,认为大机器工业才是资本主义经济之本。1897年,梁启超提出了中国必须“以工立国”^⑤的论断。1898年,康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② 《庸庵海外文编·振百工说》

③ 《盛世危言·技艺附言》

④ 《张季子九录·政闻录·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

⑤ 《饮冰室文集·变法通议》

有为提出了中国必须“定为工国”的观点,主张“成大工厂以兴实业”^①。从20世纪开始,“以工立国”,“振兴实业”的口号便成为中国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纲领了。早期资产阶级“以商立国”、“振兴商务”的口号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了。

由于仅仅停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表面现象上,所以早期资产阶级思想家在鼓吹学习西方,以商立国时,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表面繁华极力赞颂。在早期资产阶级思想家看来,西方“商贾通而生路日广”^②,中国只要振兴商务,就可以“为天地养无算穷民,为闾阎广无穷生业。”^③但是,到19世纪末,随着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成熟,不仅“以商立国”思想被摈弃,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讴歌声也日趋消失。在批判“以商立国”思想的同时,资产阶级思想家也开始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和矛盾的揭露与指责。

他们指责资本主义造成贫富对立,加剧了社会的动乱。严复在1895年指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奸雄的垄断,“垄断既兴,则民贫富贵贱之相悬,滋益远矣。……是以国财虽雄而民风不竞,作奸犯科、流离颠沛之民,乃与贫国相若,而于是均贫富之党兴,毁君臣之议起矣。”^④谭嗣同也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惟富有财者始能创事,富者日盈,往往埒于国家,甚乃过之;贫者惟倚富室聊为生活,终无自致于大富之一术。其富而奸者又复居积以待奇赢,相率把持行市,百货能令顿空,无可购买;金榜则能令陡涨至倍,其力量能令地球所有之国并受其损,而小民之隐受其害,自不待言,于事理最为失平。”^⑤

康有为还批判了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给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他说,资本主义竞争不择手段,损害人民利益,败坏社会道德。“若夫商业之途,竞争尤烈,高才并出,聘用心计,穿金刻石,巧诈并生。由争利之故,故造作伪货以误害人,若药食舟车,其害尤烈者矣。即不作伪,而以劣之货妄索高资,欺人自得,信实全无,廉耻暗丧。及其同业之争,互相倾轧。甲盛则乙妒之,丙弱则丁快之,当其争利,跃先恐后,虽有至亲,不相顾恤,或设陷阱,机诈百生,中于心术,尽其力之所至而已,无余让以待人矣。资性之日坏,天机之日丧,积久成俗,以此而欲至性善之世,

岂可得哉!”^⑥,在谈到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时,他说:资本主义生产人人各自为谋,不能统筹安排,造成大量人力物力的浪费;“即大作厂机场之各自为谋,亦不能统算者也。不能统算矣,则各自制物,则必至甲物多而有余,乙物少而不足,或应更新而仍守旧,或已见弃而仍力作。其有余而见弃者则价必贱,不足而更新者价必昂,既有贵贱,则贫富必不均,而人格必不平,无由致太平之治。……夫以全地之工人统算,其作器之见弃,其为恒河沙无量数,不知加几零位矣。……而今以无量数之工人之作器而弃之,是弃无量数之人,弃无量数之日力,弃无量数之精神及其他一切无量数之衣食官室器用也。又岂止暴殄天物而已哉!”^⑦总之,资本主义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不仅给社会经济带来损害,使人民利益遭到破坏,而且使人的道德品质日益堕落。

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家不仅更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矛盾和弊端,而且企图通过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等手段,来消除或防止这些矛盾和弊端。

19世纪末期“以工立国”口号的提出,说明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已经透过流通的表面现象而深入到生产领域了。而他们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种种弊端的揭露,则说明他们已经触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对抗性本质了。既然近代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已经深入到这种生产方式的本质和内部矛盾了,“以商立国”这种反映资本主义经济表面现象的浮浅理论自然要退出历史舞台了。

“以商立国”口号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时兴了一二十年之久,它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研究它的内容、特点、地位、作用,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发展变化的规律性。

(责任编辑:陈 畅)

- ① 《康有为政论集·请励工艺奖创新折》
- ② 《适可斋记言·玛赛复友人书》
- ③ 《续富国策·制机之工说》
- ④ 《原强》
- ⑤ 《报唐拂尘书》
- ⑥ ⑦ 《大同书·去产界公生业》